



留影

白 夜 著



留 影

白 夜 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留 影

白 夜 著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江 西 印 刷 公 司 印 刷

*
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插图2张 139,000字

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5月江西第一次印刷

印数, 1—23,200册

统一书号: 7203·061 定价: 0.65元

前 言

日出风景，仿佛光明的大纛，驱走黑暗，还我颜色，昭示出自然界最壮丽的美。

登泰山看日出，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传统的壮行。

我是一个登山者，又是个摄影爱好者。在泰山道旁，我常常观察那些登山看日出的人，选择几个镜头，给他们留下小影来。

从泰山脚下的岱宗坊，到南天门，要爬六千二百九十三级石阶。登上极顶，雄风拂面，万象来仪，八方景色，尽收眼底，真觉得孔夫子的话说得好，“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及至清晨，你来到日观峰，便见红日从东海腾跃而出，金光四射，太空灿烂，集美之大成了。

人们探索自己的理想，好比登泰山，过南天门，而上极顶。不管公子玉孙，还是牧童村女，在登山的道路上，都要一步一步走。走北京长安街，自然平坦，可是不能登高望远，目有所不及，怀有所不宽。平步青云，一跃而登南天门，不过是美好的空想。

泰山半中腰，有一个地方，名叫回马岭。此地奇陡，悬崖绝壁，难以行走。宋朝一个胆怯的皇帝，到此不敢再走，勒马而回。可以见得，皇帝登泰山，也要一级一级上去。怕

困难，也就别要进南天门了。

胆怯的皇帝虽然有，勇敢的人民却更多。他们有一颗发奋向上的心，去寻求理想，寻求美。每个人实现理想的过程，也就是美的过程。人类生活中存在美，正如自然中存在美一样。勇敢的人们向胆怯的皇帝回马的地方，投以强者的蔑视，奋勇振威，大步跨上去了。

我高兴能替一些登山人留影。他们中有中国人，也有外国人。其中有些人虽然不在了，但是他们的亲人提供给我以他们的形象。我认真地进行了复制，也给他们留影。

我欢喜登泰山，也欢喜看人们登泰山。我从旅伴的勇敢行为中，受到鼓舞，汲取力量。我看了看他们的留影。它们似乎向我说：

“登上泰山去，看看那光明的大纛吧，看看那壮丽的美吧！”

（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写于北京灯市口）

目 录

罗烽与白朗.....	(1)
马海德与苏菲.....	(16)
爱泼斯坦与邱茉莉.....	(25)
爱泼斯坦给白夜的一封信.....	(40)
索尔兹伯里的幽默.....	(45)
阿伦森的新闻讲义.....	(53)
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的幸福.....	(67)
太平洋彼岸的社论撰写人.....	(73)
美国主妇的《好管家》.....	(78)
从三千到三千万.....	(85)
写秃毛锥十万管.....	(91)
长江夫人忆长江.....	(101)
王芸生轶事.....	(114)
张恨水旧事.....	(124)
喜爱红颜色的女记者.....	(135)
她把纸老虎的概念首先传播出去.....	(148)

斯诺和我的写作生活

——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给白夜的信……………(162)

金钱的女儿

——白夜复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的一封信……………(189)

听斯诺的姐姐话旧……………(199)

黄花的采撷

——围绕《淮海报》的回忆……………(207)

给青年记者的信……………(216)

罗 烽 与 白 朗

(一)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
那里有森林煤矿，
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

这是三十年代之歌。伴随着这支歌声，出现了许多东北作家，其中就有罗烽和白朗。当年两人年华正茂，英才卓犖，英勇猛健，纵马驰骋在东北大野之上。而在半个世纪以后，我在北京见到了他们。罗烽彬彬儒雅，步态从容，眼光亲切，言词娓娓。白朗神情默默，眼光淡淡，行止缓缓，病体显得怯生生的。他们盛年不再，不过当日文采，应该照例常青吧！

罗烽和白朗，都是名作家。然而他们无名已经多年，成了从中国文坛上被遮没了的两颗星。丁玲告诉我说：

“我写些文章，人们知道我又出来了。可是，多少年来，白朗受到迫害，患了精神分裂症，已经不能写文章了。人们还不知道她究竟怎么样。报纸刊物可以介绍一下吗？”

自然，介绍白朗，也就要介绍罗烽。他们如影随形，相

依为命。丁玲曾经告诉我，白朗不想说话了。我请她说话，她果然摇摇头。经过长期的沉默以后，话一定会更多的。然而，她不想说话了。罗烽委婉地说道：“我来代她说吧！”

(二)

“白朗的祖父是个中医，父亲做过小官。我同白朗是姨兄妹。在她十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。不用说，她的童年生活是艰辛的。”

罗烽叙述了白朗以后，又叙述起他自己。

“我的祖父是山东人。因为生计无着，他就带着一家老小从蓬莱坐船，逃荒到关东。我父亲是个邮差，虽然收入不多，可是职业稳定，日月勉强可以支撑。”

青梅竹马的伴侣，到后来结为夫妇，自然是意中缘了。那时，日本侵略者踏上了我国东北的土地。他们双双参加了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。一九二九年，罗烽成了共产党北满铁路第一个产业支部的书记，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党的地下印刷机关，同时又是支援抗日游击队的物资转运站。一九三三年党委派他开展满洲文艺运动，而白朗在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当文艺副刊主编。小小年纪的她，就显露出俊拔的文思来了。黑暗中的人们，从这个副刊上，常常看到光明的信息。他们团结了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，用笔同敌人作战。

一九三四年，叛徒告密，满洲党遭到严重破坏，罗烽也被捕入狱。经过多方面营救，一年以后，罗烽出狱了。他偕同白朗，化装南下，到了上海。在这里，他们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和小说，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。不料张春桥那时就

出来说，东北作家要打回东北去，把作品带回原产地加工。他是习惯于使暗箭的狡狴人物，妄想搅浑上海革命文坛，为虎作伥。鲁迅在《三月的租界》一文中，严厉批判了张春桥的谬论。与此同时，罗烽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呼兰河边》的后记中说：

“这鬼鬼祟祟，躲躲藏藏的把戏，我也不大喜欢。最好把脑袋从战壕里伸出来，光用枪杆挑着帽子东摇西摆，我是不能轻易浪费我的子弹的。”

其实，当时的上海文坛正需要闯一闯。在酒绿灯红，金迷纸醉的气氛中，看看用血泪描出来的图画，不会令人清醒一些吗？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历史的场景，不正是出于一大批冲破屠场炼狱的东北作家的重彩浓抹吗？

全面抗战的烽火点燃起来以后，罗烽和白朗离开上海，转战湖北和四川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，他们参加了作家战地访问团，踏遍中条、太岳、太行山区。罗烽回忆说：

“我们到太行山访问时，天气已经冷了。八路军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件棉坎肩。可是这时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。在一盏小油灯下，杨献珍给我们讲了当时当地的一个真实故事，说的是一个国民党的专员的夫人，却是打进来的日本特务。我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小说——《专员夫人》。”

他俩没有虚此一行，回到重庆，仍然在警报与狂轰乱炸中埋头写作，把前方军民抗战事迹传给大后方，增强人民抗日决心，打击消极抗战的投降派。白朗出版了两个集子，《我们十四个》和《老夫妻》；罗烽出版了一个集子《粮食》，并发表了七十余首战地小诗。

一九四〇年，蒋介石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。周恩来安排重庆的一些文化人，撤退到延安去。白朗作为八路军家属给送走了。罗烽、张竹、艾青三个人一块走。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情况，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不化装，走韩城过黄河直奔延安。那一带驻防的大都是西北军，其中有友军，但也有不怎么友善的‘友军’，一旦发生误会，不易调解；一是化装走大路，从宝鸡北上，混过鬼门关——咸阳，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间穿过去。那时正值反共高潮，国民党军队认为，共产党人不敢从那条路走，倒更安全一些。周恩来根据这样的分析，决定他们几个人走后一条路。

“我和艾青、张竹三个人穿了中央军的军装，”罗烽笑道，“我扮演一个勤务兵，手里拿了榆林友军邓宝珊的护照，上面写上假名字，印了假名片，大摇大摆走大路，果然没有碰到多少麻烦。到延安那天晚上，住在南关一个小旅店里，大家唱起陕北民歌来，高兴得要发狂了。”

(三)

罗烽取出一份影印件来，那是一封珍贵的信。

罗烽同志：

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，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。如有所得，请随时示知为盼。

此致

敬礼

毛泽东

四月十三日

这封信，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写的。那时，罗烽和白朗同毛泽东住得很近。他们曾经应邀到他的家里去作客。

罗烽笑道：

“我们去作客那一天，毛主席笑道，‘今天请你们作客，不谈工作。’我们完全象普通主客之间相处。吃过饭以后，主客还打了几圈麻将。”

东北解放以后，罗烽和白朗回到家乡去，拜访了久违的白山黑水。白朗写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女战士，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”罗烽说，“白朗三次去朝鲜前线，在枪林弹雨中采访，最多一天访问了三个人，写了上百篇特写。”

白朗在一边默默无声，翻动着新的杂志。我故意逗她说话，问道：

“你认为，报告文学，或者特写的重要之点是什么呢？”

白朗不想多说话，只说了四个字：

“如实反映。”

于是，我就同罗烽讨论起报告文学来。罗烽补充并且发挥了白朗的思想。他说：

“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，必须符合实际情况，不能添枝加叶。但是，在艺术加工上，作者是大有可为的。不然，就只存报告，而无文学了。报告宜具文学色彩，文学不改事物面目，这就是报告文学。”

“太史公的《史记》中，”我说，“就有许多报告文学。比如列传中的人物，千载而下凛凛有生气，就是因为事迹既动人，

而又具有文学色彩。既然具有文学色彩，就允许作者在不违背真实的情况下加工。太史公在收集到霸王别姬的对歌时，如果觉得还不够美，文字略加润色，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根本没有两人的对歌，就不能凭空捏造了。”

当然，这是个大胆的假设，无法对证。罗烽笑笑，白朗默默。

(四)

白朗在景色佳丽的北戴河写文章，然而，她的心情并不见佳。邓大姐正好也在北戴河，就约她去玩。她对邓大姐说，现在北京正在批判丁玲的“一本书主义”，她想不通，写一本书有什么不好呢？如果写出象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一样的著作，不是多多益善吗？邓大姐含蓄地说，总理说过，现在往往上边要什么，下边就给什么。这件事不久为人们所知道了，就给白朗加上一条通天罪，为丁玲翻案。而罗烽呢？欲加之罪，也不患无词。他在一九四二年写的《还是杂文时代》，也给翻了出来，加以大批判。而事实是，哪一个时代皆有杂文，因为哪一个时代都有讽刺的对象。而取消杂文，就要首先取消讽刺对象。而讽刺对象往往在杂文的讽刺声中，才稍稍少起来。秀才遇见兵，道理讲不清。夫妇两个，一齐充军到了北大荒。

“戈扬曾经说过，”我对白朗说，“她同你住在一个地窖子里。”

白朗不想说话。对于她来说，痛苦的回忆是不能忍受的。而罗烽的精神，却是那么健全。他又代白朗说：

“那时寒冬十月，我们把冻土、苇根挖起来，修筑大坝。白朗身体不好，总算受到照顾，派她烧水。那时烧水也不容易，要到沟里刨冰，到野地去拾枯苇。这叫她一个人干，不是照顾她，而是整她。白朗成天在大风里跑来跑去，在露天烧水，烧了一个月，脸都冻黑了，冻烂了。我看了不忍，就在休息时帮她刨冰块。结果，这也构成了罪名。因为，我连自己的剩余劳动力的使用权也没有。他们说：‘你没有通过领导，擅自行动。’他们整我，也整白朗：‘你为什么要人帮助你干呢？你怕苦。’在那个时候，是没有理可讲的。”

白朗夫妇经受的锻炼是很多的。

他们管理招待所，好比开个夫妻店，招待来往客商。

罗烽管理菜园子，拔草浇水，送给人们绿色的营养。

他们下矿劳动，上下一百七十多级的木梯。

白朗织地毯，把白发也织进了花朵里去。

唐诗说：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他们对此是有亲切之感的。

(五)

罗烽递给我两份白朗写的原稿。这是两篇没有发表的报告文学，钢笔字体秀逸可喜，仿佛魏碑一样，一笔不苟，连标点符号都清清楚楚。说实在的，在我的记忆中，还找不到一件原稿来同它比美，看这种字，就是一种享受。我不禁叹息道：

“可惜写这字的手，多少年来不写字了。”

罗烽夸奖起白朗的字来。白朗替他抄了好多稿子。大动

乱年代，这些稿子曾保存在一个考古学者的家里，一共二十几份。当然，他是看过白朗字迹最多的人了。他说：

“她的字写得又快又好。过去，她刻过蜡纸，印过党的秘密宣传品。”

“看工整的字，是一种艺术享受。而看天书，那就是受罪了。”

“写字也有个群众观点问题。”罗烽说，“想想排字工人吧！他们要把这些字，一个一个排出来。如果你写得清楚，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提高。如果你写得乱，一个字要认半天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一九六八年，强加在白朗头上的屈辱的帽子已经摘去了。生活中添了一些笑容。然而，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，遭受冷遇还是有的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白朗还是鼓起勇气，拿起笔来，刻画时代中的英雄人物。

《火花》就是描写一个电话员的。

“她清瘦、矮小、短分头，旧制帽，白黑透灰的绑腿扎得笔挺，一条旧皮带紧系着腰。她通身能够遮遮风寒的也许只有那件分得地主的薄棉袄吧？但她却迎风而立，昂首挺胸，精神抖擞，小腰板标杆溜直，那神气，活象一株不畏严霜酷暑的小青松。”

白朗用热情的笔调来描述她的事迹，那是十分感动人的。比如说：

她用自己的乳头喂一个电话员的孩子，使她能够安心工作。

一个同伴没有空织毛衣，开个头，老放在那里。她偷偷

地把它织好了。

她拿到了奖金，舍不得用，零存起来，一笔一笔送给最需要的人。

一天下雨，路遇一个抱孩子的妇女，她把伞遮了母女两个，而自己手中的饼干却湿透了。

如此等等，等等。

“她的全身火花耀眼。”白朗这篇报告文学最后说：“她称得起是一个新中国的新型妇女，一个红光闪闪的共产党员，一块革命的优质钢。”

要写好一个人物，必须对他有细致的了解。在《假如我是一个旅客》中，白朗写道：

“十多天来，我作为一个特别旅客，白天，站里站外，在旅客与职工之间活动、观察；夜里，再回到姑娘的住处，记录下那数不清的好人好事，而后琢磨到入睡。我企图从每天积累的现象中，从每一个职工习惯而忘我的劳动中找到问题的答案。终归，我想在职工身上找到的东西却在旅客中发现了。”

白朗在文章中，写下了九个“我亲眼看见”，还打了许多省略号。可以想见，她亲眼见到的事物是十分多的。一个记者，一个作家，一个历史家，要更多地写些亲眼见的东西才好。

(六)

即使在屈辱的日子里，罗烽也没有放下笔，没有离开火热的生活。他舍不得自己的文艺事业，而这事业又是属于人

民的。

罗烽到了海州露天煤矿，同工人一起劳动。他学会了操纵打眼机，不过两臂也给震得够酸痛的了。有一个时期，他连饭都吃不饱。罗烽说：

“我就设法买到了些橡子面，别的都买不到。可是橡子面涩，如同砂粒一般，到喉咙里却咽不下去。”

不仅如此，那个时候，他接近工人也是困难的。他说：

“我同工人接近时，一字一句都要先推敲好了，怕出问题。他们对我的异乎寻常的身份，也有戒心。”

当然，时间久了，罗烽发现工人还是好接近的。他在这里当了个工会宣传委员，实际上就干些发材料，写墙报，搭彩棚，拆彩棚的事。然而，就是这些事，他也干得欢。他接触工人多了，生活充实起来了，创作的冲动也发生了。他笑道：

“我要创作了，可是怎么写呢？写一个反面人物，就会有人按他的职务自动对号。比如我写《第九盏红灯》，其中有一个反面人物，写谁呢？写科长、工会主席？还是写组长、支部书记？我都怕人出来对号，找我算账，使我有口难言。我想来想去，索性把自己的身份请出来吧！把工会宣传委员列入反面角色，而我就是名符其实的工会宣传委员。我想，这可不怕人对号了吧！反正我又不是表扬工会宣传委员的。”

“我想起鲁迅的一个故事来，”我笑道，“大意说他写文章，总是避免写老二、老三不好。因为，人们会借以怀疑他是攻击他的两个弟弟，周作人和周建人，进行挑拨离间。可以见得，对号之风，前已有之。”